

场共同体: 陌生人社区建设的本位取向*

◎ 何绍辉

内容提要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之住房体制改革的影响,商品房社区日渐成为新型城市社区的重要形态。由商品房开发建设而形成的陌生人社区,是现代城市社区发展的主要趋势。陌生人社区与以熟人社会为特质的地域性社区共同体不同,其在社会空间结构、组织权力关系等方面呈现出社区成员的高流动性、空间结构的开放性、权力关系的扁平化及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等诸多新特征。化解以社区治理重心转移难题、社区公共道德培育与建构难题和社区社会整合能力提升难题为具体表征的社区建设之共同体缺失问题,是陌生人社区建设和治理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走出陌生人社区建设困境,要以场共同体构建为目标,重点在积极推进社区自治、提升社区服务质量、重塑社区伦理精神和推进社区融合等方面着力。

关键词 陌生人社区 社区建设 社区治理 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109-07

DOI:10.15895/j.cnki.rwzz.2015.04.017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之住房体制改革的影响,商品房社区日渐成为新型城市社区的重要类型。由商品房开发建设而形成的新型社区,多半是陌生人社区。与以熟人社会为特质的地域性社区共同体不同,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其社会空间结构、组织权力关系等均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如何适应城市社区性质的这一变化并破解陌生人世界中的和谐社区建设难题,^①不仅是当下中国商品房社区开发建设中的重要主题,也是城市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

一、陌生人社区的本质特征

社会结构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现代化推进的客观结果。社区是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与传统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熟人社区相比,陌生人社区在成员构成、空间结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

秩序维系机制等方面呈现出诸多不同。

第一 社区成员的高流动性。在传统熟人社区中,尤其是在传统村落社区中,社区成员更替与人的生命周期基本同步。对传统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而言,一个人一旦出生在某个社区,终其一生的生产与再生产便与此社区紧密关联。即使到近代,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因为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社区成员的流动性依旧很小。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户籍管理制度有所放松,进城务工成员大量增加,城市社区新移民不断涌现,社区流动性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城市住房改革制度的实施,商品房大量涌现,货币取代血缘、地缘与业缘成为社区成员筛

*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陌生人社区建设中的场共同体构建研究”(13CSH03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4M562124);湖南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2014RS4018)

^① 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7期。



选的新中介,这同样增加了社区成员的流动性。不难发现,商品房大量涌现后,不仅城市居民搬进高楼大厦之中,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或加入买房队伍,或在社区中租房而居。商品房属于人们的私有财产,产权可交易、可转让和可退出,伴随产权交易的频繁,社区成员流动性亦与日俱增。

第二,空间结构的开放性。在传统单位制社区中,单位与小区往往合一,社区空间常常局限于单位内部,人们在单位内生活就相当于在社区中生活,上班、小孩入学、购物以及医疗、养老等与单位息息相关,甚至全部由单位负责,可谓“单位包揽一切”。在单位社会中,社区空间与单位空间合一,外单位的人很难进入,更别谈一起居住、生活,封闭性是单位社区在空间结构上的重要特征。与单位制社区不同,以商品房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因为成员的高流动性,以及房屋产权拥有者的异质性,再辅以“职业”与“居住”分离,社区空间结构相对松散、开放。陌生人社区空间结构的开放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理空间的开放性,商品房社区的地理位置虽然相对固定,但社区常常容易伴随拆迁、合并以及开发商变更等而在物理空间形态上变革频繁;二是社会空间的开放性。与传统单位制社区的“统包统揽”的“总体性”不同,陌生人社区的“生活性”更强,居住、休闲等是陌生人社区的主要功能。由陌生人社区的“生活性”所决定,社区外成员进入社区,相比传统的单位制社区要简单和容易得多。而在传统单位制社区,非本单位成员往往很难进入。在以商品房为典型的当下中国陌生人社区,只要获得房屋产权,就有资格成为房屋所在社区的成员。

第三,权力关系的扁平化。在传统单位制社区中,由于单位与社区合一,单位组织结构往往就是相应的社区组织结构。科层化是单位制的重要特征,这一特点在传统单位制社区中体现尤为明显。如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就业机会、政治权利等等都与单位(社区)息息相关,单位(社区)控制了生产和生活资料。在单位社区的权力关系中,科层化、层级化是传统单位制社区中权力关系与格局的重要特征。与之相反,在以商品房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中,“城市本身由于单位制解体,旧城改造,新

建小区大量涌现,职住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多”。^①职业与居住分离,社区虽然是人们的生活重心,但不再是人们的生产中心,每一位社区成员都只是社区中的一员,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以及开发商等小区管理者,从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为社区业主服务的人员,不再具备传统单位制社区的那种上下级式威权关系,整个社区权力关系呈现出扁平化特征。

第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是现代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所谓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提供社会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②社区的供给,就是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形式之一。与传统的“包揽一切”的单位制社区不同的是,在以商品房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中,无论是小区绿化与环境整治,还是小区治安与公共安全,这些社区性公共服务大多由社区供给。社区提供公共服务,是陌生人社区区别于传统社区的重要特征。陌生人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并不是说政府不再提供公共服务,只是相对于传统的单位制社区而言,陌生人社区中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日渐多元化,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还有社区志愿者等等。

二、陌生人社区的生成机制

社区是社会的微观表现形式。陌生人社区的出现、形成与发展,与社会结构形态的陌生化转向及社会流动等关联甚大。

首先,陌生人社区是陌生人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结构形态及性质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形态与性质变化的微观反映。陌生人及陌生人社会一直是社会学家们探讨的主题。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

^① 龚维斌《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及其变革》,《新华文摘》2013年第24期。

^② 孙晓莉《中外公共服务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①在熟人社会中,复杂交织的人情网、关系网以及熟人圈非常重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为根本的变化就是陌生人的出现与进入。鲍曼曾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②应当说,现代社会就是由陌生人所构成的社会,陌生人是现代社会的构成主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说,我们的衣、食、住、行,在陌生人的参与下进行;我们的生、老、病、死,在陌生人的帮助下完成。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弗里德曼所言“现代社会有一个较简单社会中几乎完全没有的特征:依赖陌生人。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们搬进陌生人——我们希望能精巧地——建造的房子。”^③正是伴随整个社会结构形态的转型,尤其是陌生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陌生人成了民众日常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社区社会生活中,同样如此。我们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商品房社区,维持社区生活安全的保安、清洁社区卫生环境的保洁员、负责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的社区管理者等,都是与社区业主没有任何血缘、地缘或亲缘关系的陌生人。在传统社区中,类似社区公共服务要么是自给,要么是由社区中的熟人来提供;而且,居住在传统社区中的人彼此之间或有业缘、或有地缘联系,这些在当下商品房社区中早已不复存在。

其次,单位社会的终结催生了陌生人社区的形成。在已有学术传统中,作为对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比较宏观和恰切的概况与总结,单位社会总是被提及。单位社会的总体特征包括:(1)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连接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2)单位组织体制的高度合一性,即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是生产管理机构,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管理机构,具有高度的合一

性;(3)终身固定就业与“包下来”的单位福利保障制度;(4)基于单位组织的自我封闭性而形成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④自1980年代开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与实施,整个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立以来的“单位制”或者说“单位社会”发生了转变,社会转型成为人们理解这一变化的重要关键词。对于单位社会的这一变化,田毅鹏教授曾经将其概况为“单位社会的终结”。^⑤然而,正如田毅鹏教授等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单位社会的总结,并非指具体的作为职场的‘单位组织’的终结,而是指1949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宏观联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即由‘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模式的转变。”^⑥也正是伴随单位社会的终结,社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由于职场意义上的单位社会的解体,“单位办社会”的告罄,单位社会福利亦退出,典型如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福利房的退出与商品房的出现。大量经济适用房、公房、房改房等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与单位社会有着某种千丝万缕联系的住房保障体系肢解,而以货币购买为中介的商品房大量涌现。商品房的购买,依靠的不再是相同的职业与社会地位,而是货币。五湖四海、不同肤色、年龄与社会地位人群因为产权的购买进入到同一社区,这些以货币为中介、以房屋产权为纽带的社区成员,彼此之间缺乏单位社会那种特殊的“熟人连接”,“见面不打招呼”“老死不相往来”成为常态。

最后,高频率的社会流动加快了陌生人社区的生成。流动是当下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结构特征。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城市规模和空间不断扩大,“乡土中国”日渐为“流动中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英]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吕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③ [美]弗里德曼《论现代法律文化》,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

④⑥ 田毅鹏、吕方《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⑤ 田毅鹏、漆思《单位社会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国”所取代。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相当于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①对中国2012年人口迁移流动特点进行的深度分析发现:从流动迁移模式上看,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迁移的主体模式,新生代流动人口表现更为突出;超过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居住。人口流动的频繁,尤其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不仅使商品房社区的陌生性凸显,即使是在传统的单位房、公房等非商品房社区,也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迁入,社区陌生化正在加剧。这种高频率的社会流动,使得陌生人社区的形成成为必然。

三、共同体缺失:陌生人社区的治理难题

在熟人社会中,人情是最重要的联结纽带。熟人社会的治理,常常借助于人情的中介作用,尤其是拟亲化的形式,通过自己人的治理来达至熟人社会的善治;熟人社会的治理,除了信息透明度高,还有以情动人、比长比短的举例说明这两个特点。^②在以陌生人为主体所构成的社区中,熟人社会的维系纽带和运作机制如人情、面子以及礼俗不再能发挥主导作用,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日渐浮现出诸多新难题。

一是社区治理重心转移难题。单位社会终结后,原本由单位“代办”、“代管”的许多事情开始回归本位,企业管生产、学校管教育、社区管服务,单位成员开始向社区成员转变,单位人逐渐过渡为社区(社会)人。“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表明社会管理的重心从‘工作场所’向‘居住场所’的转移。这种转变和转移,意味着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的转换,意味着社会日常生活的支持网络的转换,意味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机制的转换。这是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一。”^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离不开社区的善

治。实现社区善治,就要在社区治理和建设的过程中,实现重心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和转移,着重从提升社区管理者素质、培育社区居民自治以及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等方面入手,积极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

二是社区公共道德培育与建构难题。在传统的以熟人社会为特性的单位社区中,伦理道德往往是维系社区运转的重要纽带,是社区社会秩序有序与有效的重要支撑。伴随现代性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市场主义、公平竞争和利益机制等日渐成为陌生人社会中的主导性力量,构成陌生人社区运转的重要基础。与单位社区不同,陌生人社区中的人不再具有某种血缘、地缘或职业纽带联系,彼此之间是一种以产权和共同居住为纽带的平等关系,私人关系较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公私分明、泾渭有别。因缺乏强有力、普遍性的伦理关系与纽带,怀疑便成为陌生人社区的重要关键词。生活在陌生人社区中的所有人对社区生活都很陌生,他们需要面对诸多的来自陌生人之间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如何重新建构陌生人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继续发挥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价值,使其尽可能地发挥作用,并着力建构公共道德,发挥政府在公共道德建构中的主导性作用,或许是应对陌生人社区中道德真空的路径选择。

三是社区整合能力提升难题。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或媒介将社会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各个部分和各个环节结合成为一个相互协调、有机配合的统一整体,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的一个过程。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任何社会的存在、运转和发展都离不开良性社会整合。然而,当社会整合所需要的条件、要素和载体缺失时,社会整合力就会下降,社会整合就会出现危机,风险社会就会形成。而所谓社会整合危机,是指由于社会整合的载体或中介的失调或缺失而使社会整

^① 参见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 <http://www.chinapop.gov.cn/ldrks/s7847/201309/12e8cf0459de42e981c59e827b87a27c.shtml>。

^② 贺雪峰、刘锐《熟人社会的治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③ 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7期。



合力下降,使社会系统出现不协调、配合不和谐的状态,整合社会陷入“规范真空”。^①现如今,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正在横行,而以个体意识、个体权利甚至是个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也正在形成。这种社会的雏形,在新型商品房社区中表现尤为明显。在这样的社区中,“个体的产权意识逐渐增强、环境意识明显增强、个体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区分越来越清楚、个体的民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②如何正确地回应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做好群众工作,增加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一致行动能力,加强社会整合,无疑是商品房陌生人社区建设所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要而言之,无论是陌生人社区治理重心转移难题、社区公共道德培育与建构难题还是社区整合能力提升难题,本质上都是社区共同体精神的缺失。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住房体制改革与商品房社区大量涌现以来,社区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巨变,社区共同体、村落共同体等日渐式微。人口异质性的增加、理性化和非人格化程度的大量增多,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不仅使传统的熟人社区维系纽带功能弱化,新出现的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维系纽带亦缺失,再辅以个体意识的发育与扩散,无疑给陌生人社区建设和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四、场共同体: 陌生人社区建设的本位取向

滕尼斯的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揭示与阐明了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所存在的两种主要类型: 共同体与社会。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体的记忆之上的”。^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基点在于做好基层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要在社区治理创新中推动和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是中国城市新型社区发展的趋势,也是未来中国城市社区的重要类型。加强和创新陌生人社区治理,是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

核心议题。从陌生人社区治理难题的纾解出发,陌生人社区建设,既无法再回归到传统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又必须摒弃陌生人社会中的各种弊病。为此,可选择“场共同体”这种较为适宜的建设模式。所谓场共同体,就是不再以地域或血缘为基础和纽带,也不再具有地域性和社会性等本质属性,而是以利益和情感整合为基础所构成的生活共同体。

首先,从利益维度而言,产权的社会属性是场共同体建设的核心。陌生人社区建设目标——场共同体的形成,核心在于住房产权的私有。房屋产权的个体化与私有化,致使房屋所有权人与特定的社区发生关系,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房屋产权人的切身利益。在场共同体培育过程中,要注重考虑产权的社会属性,尤其是要注重发挥产权的社会属性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场共同体能否构建成功,关键在于社区居民对房屋产权及其所勾连的地域的认可程度。为此,要注重改善社区环境,增强社区居民对环境的关心程度,提升房屋区位品质,增加房屋的市场交易价值,进而增强居民的地域认同。这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建设之重点所在,也是“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是要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凝聚力量强的意义共同性,即社会共识”^④的客观要求。

其次,从情感维度而言,社区公共意识与社区一致行动能力是场共同体构建的两大支点。社区意识和社区行动是分析和理解场共同体的基本向度,也是衡量场共同体本身是否形成、是否建构成功的基本维度。一般地,一个有着较强社区认同、较多社区行动的社区,就是场共同体;社区意识强,社区行动就多,反之亦然。做好陌生人社区中的场共同体建设,应在社区意识和社区行动上发力。从社区意识

① 何绍辉《社会整合危机初探》,《黑河学刊》2006年第4期。

② 郑杭生、黄家亮《中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特点新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③ [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④ 郑杭生《学会、学派、学术——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14年7月11日,参见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4-07-19/18416.html>。



培育角度而言,重点应在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社区归属与社区满意等方面着力。就社区行动组织而言,重点应在社区居民的社区互动、社区参与与社区互助等方面着力。社区意识与社区行动是场共同体的一体两翼,缺一不可(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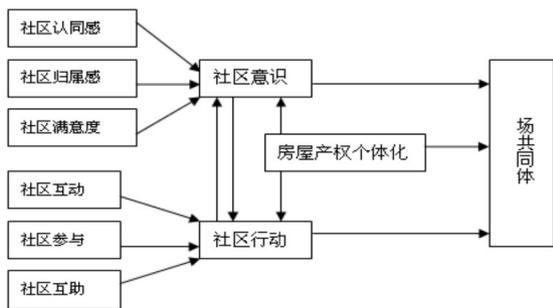


图1 场共同体结构图

场共同体作为陌生人社区建设的一种理想类型,与传统的单位制社区、地域共同体以及行政性社区均不同。与单位制社区相比较而言,单位制社区的突出特点是职业与居住合一,单位就是社区;而场共同体则是职业与居住分离,生活性是场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地域性共同体相比较而言,地域性共同体更多的是突出区域性,封闭性特征凸显;场共同体虽亦有地域限制,但地域性特征并不显著,开放性是其根本属性。与行政性社区相比较而言,行政性社区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意义上的社区,是一种“社会”而非共同体,这是一个松散的组合;场共同体则是一种突破地域认同的“归属感”,因为邻里互助、邻里相依以及彼此认同而形成的有机联系与组合。

与以往的各种社区建设理想类型相比较而言,提出“场共同体”这种建设模式,还基于社区社会整合机制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变迁。在传统单位制社区中,无论是横向社会整合还是纵向社会整合都比较强,前者典型如单位认同或业缘联系,后者典型如血缘或地缘等自然认同。可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商品房小区中,不仅市场主义逻辑蔓延,过去那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纵向社会整合早已不再,社区历史断裂,社区记忆缺失。而且,基于业缘等横向社会整合机制也在弱化与瓦解,小区居民之间的联结纽带日趋单一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利益和情感为维度,建设以增强意义感为旨向的场共同体,不失为当下中

国陌生人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向。

总之,伴随30多年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整个社会出现了原子化、个体化与扁平化,这些趋势不仅侵蚀了中国社会秩序的社会基础,更是带来了一些我们所不能面对的矛盾、纠纷和问题。面对和化解家庭分离、社区共同体弱化、社会合作减少、人际关系淡化、社会道德和诚信衰退、个人不稳定和焦虑感增强等个体化带来的风险^①,加强社会治理是题中之义。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在社区。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②场共同体作为陌生人社区建设的一种理想模式,可以而且应该加强。要通过加强社区共同体建设,增强社会自我约束,发挥家庭功能、社区合作等传统资源优势,提升社区社会质量,这既是走出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的关键,也是当下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与方向。

五、在场共同体构建中走出陌生人社区建设困境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存在如下困境:“一是仍然习惯于行政管控,服务与管理并没有有机结合,还是管控多服务少;二是外来人口尚未真正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内,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存在困难;三是缺乏顶层设计,党政机构职能和机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四是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城市社会发展需要;五是社区建设面临诸多困难,社区居民社区认同度不高,社区自治程度低;六是城市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滞后,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新的不平等”。^③城市社会治理体制的上述困境,同样给当下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建设以挑战,致使陌生人社区建设与治理出现了诸多困

① 王春光《个体化背景下社会建设的可能性问题研究》,《人文杂志》2013年第11期。

② 《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光明日报》2014年3月6日第1版。

③ 龚维斌《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及其变革》,《新华文摘》2013年第24期。

难和问题。走出陌生人社区建设困境,就要围绕场共同体这个根本性方向与目标,以房屋产权个体化为中心,从社区意识塑造与社区行动培育向度出发,积极推进陌生人社会治理走向善治。

首先,要以社区参与为重点,积极推进社区自治。加强社区自治是走出陌生人社区建设困境的前提。推进社区自治,核心就是要鼓励和动员广大民众参与社区事务。社区参与一直是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是社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居民是社区的主体,社区的问题,本质上是社区居民共同的问题。要借鉴台湾地区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在解决社区问题时鼓励和动员全体居民共同参与和讨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推进社区居委会职能转变,努力使居委会从政府的“腿”向居民的“头”转变,尽可能地让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发挥民间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工作者以及业主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要积极总结和推广天津滨海新区等社区建设经验,以流动人口参与为重点,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和有力力量,形成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分工合作、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推进社区建设的局面。

其次,要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着力提升社区服务质量。提升社区服务质量是走出陌生人社区建设困境的关键。要在认真总结杭州“三化三网三落地”等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着力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厘清政府职能,加大社区投入,改善社区环境;以“岳麓模式”等为参照,积极推进网格服务,进行网格化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要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平竞争的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努力推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社会治理服务的格局,构建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全覆盖。要以智慧社区为方向,以业主为中心,充分利用高科技、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打造高端智慧社区、幸福社区和低碳社区,着力创新社区服务模式。要大力扶持社会工作者队伍,提升社区工作服

务水平和质量,积极推进社区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第三,要以认同归属为核心,努力重塑社区伦理。塑造社区意识、重塑社区伦理是走出陌生人社区建设困境的核心。要注重创造归属感认同,注重培育社区成员的“社区共同体”思想意识,并以此来带动社区成员的家园意识、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养成。要注重培育社区成员的公民意识、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积极推动社区居民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着力培育现代社区公民。要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鼓励社区居民积极践行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区文化建设全过程。要注重社区充权,广泛开展社区公益活动,为社区居民交往提供载体,努力推进社区居民从“陌生”到“熟悉”的转变,推进陌生人社区从居住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兼具的场共同体成功转型。

第四,要以居住空间优化为抓手,极力推进社区融合。推进社区融合,是走出陌生人社区建设困境的有效手段。空间议题一直是新城市社会学关注的主题,空间转向是城市社会学走出传统理论窠臼的重要契机,为区别于“旧的城市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维度。^①从空间理论出发,走出陌生人社区建设困境,就要注重不同类型住房的合理搭配,在居住空间优化上下功夫。要借鉴西欧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着力避免城市郊区化与贫民窟的出现,以城市和谐为目标,合理设置商品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在同一小区中的比重,慎防住房隔离而衍生阶层区隔与空间隔离,要让不同地位、身份、职业与收入的人群在同一社区中共同居住,共同解决社区难题。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

^① 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